

- 设[J].南京社会科学 2017(2).
- [2]李长莉.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三十年发展趋势与瓶颈[J].南京社会科学 2017(1).
- [3]梁景和,冯峰.社会文化史行进的四重维度[J].河北学刊, 2017(2).
- [4]郭常英.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语境中文献传播若干思考[J].史学月刊 2017(1).
- [5]张立程.从微观史、日常生活史到社会文化史[J].河北学刊, 2017(2).
- [6]左玉河.寻求意义:深度解释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化[J].河北学刊 2017(2).
- [7]李长莉.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热点与缺陷[J].武汉大学学报 2017(1).
- [8]任吉东.近代城市史研究中的城乡问题探微[J].武汉大学学报 2017(1).
- [9]余新忠,郝晓丽.在具象而个性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7(2).
- [10]李俊领.日常生活:社会史研究的对象、视角与跨学科对话[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2017(5).
- [11]史敏.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 2017(2).
- [12]朱英.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缘起、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运用[J].近代史研究 2017(5).
- [13]余新忠,陈思言.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17(3).
- [14]芦笛.中国近代医药史研究及相关问题评述[J].史林 2017(1).
- [15]汪效驰,李飞.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一项战时交通社会史的考察(1937—1945)[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7(6).
- [16]武涓宇.辛亥祭奠的死亡表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骷髅符号释读[J].近代史研究 2017(2).
- [17]李军全.节庆与政治传播:中共华北根据地的春节宣传(1937—1949)[J].中共党史研究 2017(4).
- [18]徐秀丽.革命年代的饮食儿女:读章瑞荣家信[J].史学月刊, 2017(4).
- [19]李卫民.黄兴涛与新文献学:基于《“她”字的文化史》的研究[J].晋阳学刊 2017(5).
- [20]邱志红.“鬼话”东来“红毛番话”类早期英语词汇书考析[J].清史研究 2017(2).
- [21]肖如平.民国时期的保甲与乡村社会治理:以浙江龙泉县为中心的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22]赵旭东,张洁.乡村社会秩序的巨变: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7(2).
- [23]崔岷,冯小红.太行山文书所见近代冀南豫北农村的普通会社组织[J].河北学刊 2017(4).
- [24]邓杰.近代以来上海城市规模的变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 [25]徐静波.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26]魏兵兵.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与城市公共空间之演进:以剧场建筑问题为个案[J].史学月刊 2017(3).
- [27]谭刚.动荡中的社会转型:大后方城市社会生活变迁 1937—1945[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
- [28]张艳.西舞东传与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迁[J].山西师大学报 2017(6).
- [29]李传斌,牛桂晓.博习医院与近代苏南社会[J].东吴学术, 2017(4).
- [30]张萍.脆弱环境下的瘟疫传播与环境扰动:以 1932 年陕西霍乱灾害为例[J].历史研究 2017(2).
- [31]姚帆.近代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国家与社会:以 1918 年鼠疫为中心的考察[J].社会科学动态 2017(4).
- [32]李秉奎.民国医界“国医科学化”论争[J].历史研究 2017(2).
- [33]芦笛.社会史视野下的晚清药物学术变迁中的日本因素[J].福建论坛 2017(11).
- [34]赵秀丽.调适与应对:天主教婚姻家庭伦理在华处境研究:以天津《益世报》为中心的考察:1915—1937[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7.
- [35]刘志庆.中国天主教教区沿革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 [36]高力克.“以科学代宗教”:陈独秀的科学主义宗教观[J].史学月刊 2017(1).
- [37]罗检秋.社会变迁与清代汉学家的宗族观念[J].河北学刊, 2017(4).
- [38]赵晓阳.19 世纪中后期海外华人的“被印象”分析:以新西兰华人华侨为中心[J].史学集刊 2017(4).
- [39]李俊领.礼治与宪政:清末礼学馆的设立及其时局因应[J].近代史研究 2017(3).
- [40]马慈祥,张科.宣教与施仁:传教士在近代青海的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J].青海民族研究 2017(1).
- [41]刘玄启.近代广西民族边疆地区慈善事业与社会变迁[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7(1).

(赵晓阳(1964—)女,重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中西交流史研究。)

理论建构与专题研究互推共振:2017 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李文 徐轶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9)

2017 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继续沿着学科理论与专题研究互推共振模式发展,其态势可喜可贺。学

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史料整理与搜集持续推进,专题研究持续拓展和深化,跨学科融合趋向进一步加强,在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妇女研究、青年研究、医疗史等领域学者的参与下,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建设、社会结构、社会治理、社会保障、社会生活和社会心态等多方面的研究均取得较丰富成果。

一、学科建设

2017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学者进一步有意识地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自身的历史特点和规律来建构自身学科理论架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为代表的“国史中的社会史”学术理念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地域化”和“碎片化”带来的不足,愈发引起了学者的高度重视。此外,当代社会史的口述研究和史料学继续发展,进一步夯实了当代社会史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首次提出了“国史中的社会史”理念。2017年4月23—25日,在云南大理召开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会第五次会议暨理论与方法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高度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学术创新意义,并从体例、视角、方法以及史学工作者“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角色转换等几个方面,从口述史、城市史、环境史、民族史以及现实重大问题研究等角度,研讨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李金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是一部教科书式的中国当代社会史著作,是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注重社会历史变化的、具有辩证思维的社会史著作^[1]。汪兵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具有扎实的学术史研究基础,对社会史研究理论问题作了回应,丰富和拓展了当代社会史的通史研究,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史通史研究的创新之作^[2]。李文结合主持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体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科如何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表了看法,强调了三个“必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从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事实出发;必须适合国史研究的大局需要^[3]。

2017年,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近年来当代社会史研究实践中出现的“地域化”和“碎片化”现象作了系

统性反思。《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0期刊发了一组笔谈《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并在编者按中深刻指出“自步入新世纪以来,基于地方档案史料的地域史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诸多以往不为人所熟知所悉的地方史图景和地方性知识得到非常成功的展现与建构,尤其在新的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新的历史知识的增长等方面成效显著,成为党史国史研究领域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培育出一大批史学人才。但随着时日推移,地域史研究也出现了诸如堆砌史料、重复叙事、微观与宏观脱节以及‘问题意识’匮乏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或弊端,严重制约了地域史研究之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参与笔谈的学者在高度肯定地域史研究学术意义的同时,对如何避免被人诟病的“碎片化”倾向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宋学勤批评了地方史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绝不能仅止于描述生活的表象,而是要寻求各类社会现象所能表达的意义及其蕴含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机理,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因素,进而总结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4]。李文、魏钦恭从学科建设与理论建设关系的角度指出,当代社会史是一个研究领域非常宽泛的学科,但由于学科理论和体系的构建滞后于具体问题研究,使得现有成果更多呈现出“碎片化”特征,而且多数研究在学科理论、历史视野和现实问题的关系的把握上仍显生涩^[5]。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口述访谈是当代社会史研究所倚重的一种研究手段。2017年1月16日《光明日报》推出了“口述历史的属性与口述史的学科建设”专刊,探讨口述历史的学科自身问题及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周新国分析了口述史的学科属性与学科设置;定宜庄指出,口述史料作为史料的一种,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逐渐呈现出来,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左玉河认为,作为方法论的口述历史具有明显的双重主体特性,历史研究者和历史当事人均为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可能带来史学研究形态的变革。此外,一些重要群体(如劳模群体)以及代表性地区的口述资料得以整理出版,亦有学者探讨了记忆史研究对拓展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价值^①。

二、社会结构研究

城乡关系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亚平分析了国家发展战略对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决

①参见姚力《生命叙事与时代印记——新中国15位劳模口述》(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李中元、杨茂林《西沟口述史及档案史料(1938—2014)》(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郭辉《记忆史理论与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定性作用^[6]。肖安森从上海农民三次大规模进城争粪风潮揭示了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三个历史时期的城乡关系^[7]。付志刚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庙会,指出这一时期的庙会既推动了城乡间的物资交流与经济发展,疏通了城乡间的物资交流,又改善了物资匮乏局面,有效地推动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互动;改造后的庙会也成为传递和贯彻国家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想、新观念的重要平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较好的互动关系,从而为构建新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奠定了基础^[8]。

阶级阶层研究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研究的热点。李路路讨论了“新阶层”对社会研究的重大意义,认为新社会阶层的形成意味着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和结构的根本变革^[9];李元书、吕庆春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政治发展研究:调节阶级层关系的理论和制度》(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中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田丰使用2006—2015年五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综合调查数据,结合年龄—时期—队列分析方法,探讨了农民工群体的“逆成长”态势,发现教育结构改善没有真正提高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其相对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自我评价反而在下降^[10]。

妇女是社会群体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妇女研究论丛》专门开设了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学建构中的性别议题”和“妇女与中国革命:延续与变迁”学术研讨会学术专栏。董一格梳理了197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性别史研究的成果,探讨了“社会再生产”成为性别史研究新范式的可能性^[11]。张霞、茹雪回顾了中国女性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认为提升中国女性经济地位的关键在于消除生产力方面的性别差异,其次在于相关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建立^[12]。贺桂梅通过对李双双、陆文婷、杜拉拉等三个女性形象的详细解读,勾勒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脉络及其内在结构^[13]。

三、社会治理研究

在城市社会治理方面,宋学勤在回顾1949—1957年中国共产党城市社会整合思想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中共组织化的社会整合路径寄托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反映了中共宏大愿景,其社会整合思想与实践“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同步”^[14]。张群梅认为,街道民主改革运动直接促进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体、方式、关系及环境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性要素的形成,使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逐步走上现代治理之路^[15]。沈毅

认为,1949年后城市基层的单位建制解构了“家本位”的传统社会结构,强化了“单位制”群体性格局,为传统“人缘取向”的中庸式人际实践提供了空间,并最终影响到了政治运动的发展进程与结果^[16]。李怀印等通过对不同城市近百位退休工人的访谈,揭示了改革前国营企业内部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庇护及依赖关系,提出了“单位社群主义”的概念,以解读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的日常治理实践^[17]。

在农村社会治理方面,对“集体化”研究的热度持续不减。2017年6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开放时代》杂志社合作举办“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第四次“开放时代工作坊”。与会者认为,十多年来对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的研究成了学术界的焦点与热点问题,但一些偏激之论不仅失去学术讨论应有的理性,而且遮蔽了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丰富内涵,似乎集体化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没有地方传统的均质化社会,似乎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民是完全没有主体性的农民;这种对共和国重要历史阶段的简单化处理,极为不妥^[18]。毛铨探讨了农村治理与农村服务体系的关系,认为农村治理变革之路即是农村服务体系形塑之路;农村服务体系孕育、生成、发展于农村治理变革的过程中,而农村服务体系最终将影响着农村治理的变革进程^[19]。

四、社会保障与民生建设研究

医疗史领域研究者的加入使得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学科融合的特征进一步加强。《医疗社会史研究》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新中国医疗卫生史”为副标题,专门讨论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演进的关系。张海柱回顾了1955—1962年集体化与合作医疗的关系,认为这一阶段农村合作医疗的快速发展是国家动员与推广的结果^[20]。

社会福利与民生建设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田毅鹏、王英娜利用经济档案等资料从长时段考察单位退休制度,认为单位退休制度由“国家—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的历史性转换是单位社会走向“终结”的重要标志^[21]。宋学勤认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形式和内容在任何时代都是由其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其保障水平既不能低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又不能超越当时经济水平所能够承受的限度^[22]。杨丽萍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市的优抚工作,认为通过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协同,烈军工属的生活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同时优抚工作的社会政治效应进一步凸显^[23]。李端祥等对城市人民公社“办一点服务性事业”作考证后认为,城市人民公社所办的服务事业,不

只是“一点”而是“大量”的^[24]。李小尉认为,“大跃进”时期虽然受运动的影响偏离了正确轨道,但基层社会福利事业在福利生产建设、传播社会福利内容与思想等方面的实践与探索却不能作简单否定^[25]。彭国华等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的变迁历程,总结了发展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工作的经验^[26]。

在灾害救助方面,高冬梅、邓莎考察了1957—1965年河北省城市弱势群体的救助情况,认为这期间的社会救助工作虽有偏差,但成效是主要的,救助工作不断走向规范、细化,为日后的社会救助提供了重要借鉴^[27]。李良玉从“大跃进”时期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份急电入手,利用大量江苏省地方档案还原了1960年代初国家社会治理中事关群众生活的政务信息流通的机理,以及中央、省和省属地县间的相互博弈关系^[28]。王爱云基于对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将新时期扶贫工作置于新中国发展历史的长时段进行考察,纠正了以往一些偏颇的认识,指出1978—1985年是新时期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起始阶段^[29]。

五、社会生活和社会心态研究

社会生活是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刘怡认为,“大跃进”期间以灭雀运动为代表的仪式化动员已成为实现革命斗争话语日常化、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并对之后的历史走向造成了多重影响^[30]。郑清坡等利用《河北日报》上的资料重构了集体化时期农村公共食堂化运动的动员过程,探讨了新闻媒体在其中的作用^[31]。李飞龙以1950—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彩礼与嫁妆的变迁为切入口,从社会变革的视角总结并分析了“婚姻支付”货币化、代际化的特征^[32]。施杨《社会转型与工人生活轨迹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考察了社会转型前后工人生活发生的变化,从职业生活、家庭生活、职业声望及社会心态等方面梳理了工人生活变迁的轨迹,探讨了变迁的动因,展示了社会转型对于现当代工人生活产生的特殊影响。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进一步加强,学术界对意识形态工作以及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潮的研究大量呈现。李洪河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书业整顿,认为国家通过相关社会宣传和政治动员、书刊查禁和收换、租书摊铺登记等几个步骤,既改变了一般民众的阅读兴趣,提升了民众的阅读品质,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33]。张放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市

小学教师的思想学习与改造过程,认为这种外来的、以政权为支撑的全盘性意识形态与教师以自身经历和传统经验为基础形成的固有认知之间存在张力,而这种张力正是思想学习与改造限度的根源之所在^[34]。此外,吴荣军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在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中的成绩和经验^[35];胡春阳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过程^[36]。

六、总结与思考

2017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在理论建构与专题研究的双重推动下取得较丰硕成果,但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仍显薄弱,研究选题仍较分散,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要求不够紧密,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仍很突出,特提出如下建议:

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从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的理论构建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任重而道远。关键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整体框架来认识、分析和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认识、分析和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既不能脱离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能忽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关系,同时须重视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地位,以及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在社会发展一定时期的特殊作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真正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

2. 把当代社会史研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挥其资政育人的作用,服务大局。党和国家对社会建设、社会和谐高度重视,为深入研究和总结新中国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及教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用两个大标题的篇幅详尽阐述了“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问题。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须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

来研究和认识、分析中国当代社会史,总结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分析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探索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发挥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咨政育人作用。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凝聚改革共识”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当可有所作为。

3. 坚持以全面的辩证思维加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个案研究要有全局观,区域性研究要有整体观。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社会历史现象极其复杂。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要想穷尽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田野调查、个案研究、地方社会史研究,特别要注意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局部与全局、支流与主流的关系。对地方的、个案的社会史研究,一定要认真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获得科学的分析、产生全面的认识。否则,一叶障目,或以偏概全,或谬之千里。国史研究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往往采取这种办法,以个别否定一般、用现象代替本质、把偶然说成必然、以局部丑化全局、用支流抹黑主流。这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特别要引起警觉的。

4. 促进学科融合,加强不同学科领域的相互合作,汲取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营养。2017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妇女研究、青年研究、医疗社会史等多学科领域学者从不同角度有意或无意地参与到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讨论中。社会史研究本身就涉及人类社会形成、发展、运转和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及层面,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社会史研究本身就是多学科交融的产物。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建设还应进一步推进学科融合的平台建设,加强不同学科领域的跨学科合作,加强研究生多学科背景教育与训练,为本学科发展汲取更多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营养。

5. 加强史料建设,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促进史料领域的合作与分享,为中国社会史话语体系建设奠定扎实的史料基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史料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超出了以往任何既有的研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各地学者专注于地方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其成就已在21世纪以来得到充分展现。同时,“地域化”和“碎片化”的质疑也纷至沓来。在“大数据”时代,技术的突破为有效整理和利用数量庞大、内容繁

杂的史料,为从底层逻辑上“打破”史料的地方性和区域局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学术界要回应“大数据”时代的需要,在中国当代社会史史料的基础建设上推动学科的全面发展与完善,实现史料的“跨地域化”和“通约化”,进而从史料的基底层面解决所谓“碎片化”问题。

[参考文献]

- [1] 李金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学术风格与贡献[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3).
- [2] 汪兵.中国当代社会通史研究的创新之作——评李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J].党史文苑,2017(16).
- [3] 李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科如何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一点体会[EB/OL].http://www.hprc.org.cn/gsyj/shs/shslyff/201705/t20170503_391362.html.
- [4] 宋学勤.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思考与反思[N].团结报,2017-05-11.
- [5] 李文,魏钦恭.学术研讨与专题研究共推学科发展:2016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扫描[J].河北学刊,2017(5).
- [6] 宋亚平.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透视[J].江汉论坛,2017(12).
- [7] 肖安森.上海市解放后三次争肥事件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17(8).
- [8] 付志刚.旧瓶新酒:庙会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互动[J].城市史研究,2017(8).
- [9] 李路路.“新社会阶层”:谱系·变革·挑战[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4).
- [10] 田丰.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J].社会学研究,2017(3).
- [11] 董一格.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视野下的共和国性别史研究[J].清华社会学评论,2017(2).
- [12] 张霞,茹雪.中国女性经济地位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启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9).
- [13] 贺桂梅.三个女性形象与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5).
- [14] 宋学勤.“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中共城市社会整合思想与实践(1949—1957)[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3).
- [15] 张群梅.街道民主改革运动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以新中国初期的开封为个案[J].史学月刊,2017(4).
- [16] 沈毅.城市基层社会关系改造与政治运动进程研究(1949—1976)[J].开放时代,2017(2).
- [17] 李怀印.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内部日常权力关系的再探讨[J].中共党史研究,2017(5).
- [18] 行龙.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J].开放时代,2017(5).
- [19] 毛铨.我国农村治理变革与农村服务体系变迁[J].求实,2017(8).

- [20]张海柱.集体化与合作医疗(1955—1962):卫生政治的话语建构逻辑[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 [21]田毅鹏,王英娜.单位退休制度研究论纲[J].社会科学战线, 2017(8).
- [22]宋学勤.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人福利问题探析——以北京市为中心的考察[J].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7(3).
- [23]杨丽萍.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优抚工作[J].党的文献, 2017(6).
- [24]李端祥.阳文书.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办一点服务性事业”的考证[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
- [25]李小尉.以生产为中心“大跃进”时期的社会福利事业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 2017(12).
- [26]彭国华,等.中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变迁历程及启示[J].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7(5).
- [27]高冬梅,邓莎.1957—1965年河北省城市社会救助研究[J].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7(1).
- [28]李良玉.中共江苏省委急电《关于粮食问题的请示报告》疏证——兼谈“大跃进”期间的政务信息流通问题[J].江苏(李文(1963—)男,山西大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徐轶杰(1981—)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环境史、社会史研究。)
-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 [29]王爱云.1978—1985年的农村扶贫开发[J].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7(3).
- [30]刘怡.“大跃进”动员的仪式化:以灭雀运动为中心的考察[J].史林 2017(1).
- [31]郑清波,高寒.集体化时期新闻媒体与农村公共食堂之动员——以《河北日报》的宣传为例[J].河北学刊 2017(5).
- [32]李飞龙.社会变革与婚姻支付: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农村的彩礼和嫁妆[J].古今农业 2017(3).
- [33]李洪河.清除精神污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书业整顿[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2).
- [34]张放.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小学教师的思想学习与改造(1949—1952)[J].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7(3).
- [35]吴荣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基本经验及其当代启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7(11).
- [36]胡春阳.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探究[J].长白学刊 2017(1).

Hot Issues , Trends and Reflections: a Scanning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the Year of 2017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Chairman: LI Wen

Chairman's words: According to Wang Jia-le , a doctoral student at China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 Nankai University , more than 1 000 papers on social history were published in 2017 , covering topics such as general social history , social structure , state power and regional society , environment , medical and social relief , daily life , customs and beliefs , and oral history. The number of papers reflects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2017. In order to show the hot issues and trends of China's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in 2017 , we have organized a group of special discussion articles to sort out and discuss which hot issues in China's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in 2017 and what kind of research trends it presented. At the same time , we have question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to give suggestions on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As far as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2017 is concerned , the position of “people-oriented” has been reiterated and the phenomenon of “homogen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have been rethought , which is undoubtedly beneficial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Chinese social history; ancient Chinese social history; 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 hot issues and trends

[责任编辑、校对: 把增强]